

我们向上流动的路越来越窄了吗?

“阶层固化”挑战中国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子女还是城市居民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语)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组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官二代”、“老二代”(全家几代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层流动的困难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读书者: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考生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递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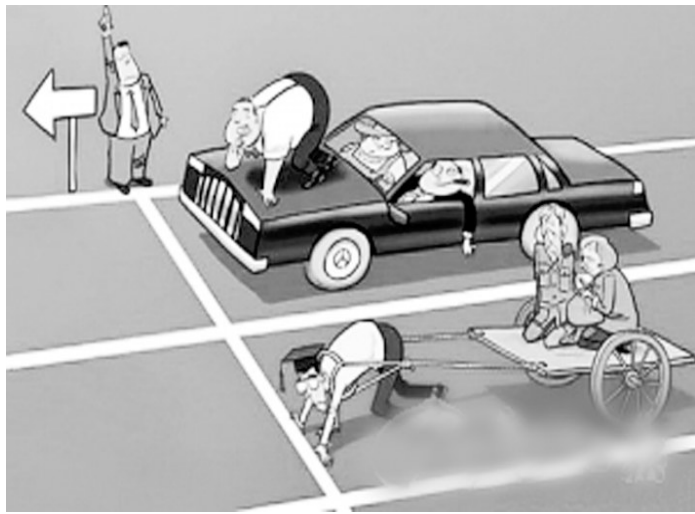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村里的孩子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寒窗苦读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起跑线上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地地也。”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会投来赞赏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改变命运的梦想难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乐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乐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

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药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

“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世面,感受一下大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想。

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

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俗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

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

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专家访谈: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识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会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困境。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

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新增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老板)。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也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社会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据《广州日报》



农民工杨王邦父子。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提高首套房利率是“手枪走火”

记者近日证实,广州各家银行已从银监会获得口头通知,即日起取消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7折优惠的政策。此前,京沪等地房贷7折利率政策已取消。(《广州日报》11月01日)

根据我国公文写作的原理,凡是发出一个通知,那第一句话的第一个词就是“为了”,据此就可作出决定的目的。那么,银监会取消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7折优惠的政策,究竟是“为了”什么?可惜,无法看到文件的表述,因为它只是口头通知,没有讲什么道理。

没有了“为了”,真不理解提高首套房贷款利率的意图。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而具体的措施,则主要是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因此利用信贷利率等杠杆,限制购房套数和外地购房者。但对于普通老百姓以自己居住为目的的首套房,不应该进行抑制。相反,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正是为了降低房价,让普通居民买得起自住房。现在,为了抑制高房价的调控政策,居然扫到了购买首套自住房的普通老百姓头上,这样的调控政策岂不是搞错了方向,误伤了好人?

我也不知道银监会统一取消首套房利率优惠的政策依据是什么。根据“新国十条”,只是要求实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三套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应大幅度提高,具体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并没有授权商业银行可以自主提高首套房的利率。商业银行提高首套房的利率,究竟是为了限制首套房的购买,还是为了提高银行的经济效益?

提高首套房的贷款利率将有什么结果?有关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对市场冲击不大”,“不会有太大的实质影响”。请注意,这里说话的是商业银行和房地产市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15%的购房者是首次置业的”,“如果物价上涨不可避免,市场上富余的闲钱仍将流向房地产市场”。如果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调低后,20年期的100万元贷款,利息差超过11万元,30年期的100万元贷款,每月需要多还款555.31元,利息更是多出近20万元。这对他们来说可是灾难。

为了调控多套房,就连首套房也被打击了;为了节能减排,提高电价,就连老百姓的用电也涨价了;为了打击大吃大喝,就连老百姓的窝头也要小下去;为什么处于最弱势地位的老百姓总是要顺带被祸害?谁来为底层的老百姓想一想? 殷国安

消费品齐涨价“稻草”恐压垮“骆驼”

最近,由于农产品涨价,不仅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价格涨声一片,国内市场的食用油价格也出现新一轮上涨,而随着行业龙头康师傅和古井贡酒分别调高旗下部分产品价格,相关的方便面和高端白酒行业也面临涨价压力。然而,分析预计年内国内食用油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仍然喊涨价,凭什么?这似乎是一场涨价竞赛。石油涨价了,猪肉涨价了,“行业龙头企业调高部分产品价格”,相关的方便面和高端白酒行业没有“涨价压力”吗?是啊,大家都涨价,谁不涨价谁就是傻子。

日常消费品涨价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价格连锁反应,推动其他相关商品价格“水涨船高”,物价普遍上涨。这样下去,“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即忍受更高通胀率或成现实。

在物价马不停蹄地上涨、通胀率不断攀升的语境下,反过来,居民收入上涨如蜗牛爬行,有的甚至多年“原地踏步”。据11月1日《人民

日报》报道,全国总工会进行的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来未增加工资。不仅工资增幅慢,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令人担心。

物价上涨不断、上涨快,收入上涨慢,甚至不涨,两者距离不断拉大,相对高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已经忍受了“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物价率先齐声喊涨,稻草也能压垮骆驼,而那些5年不涨工资的人估计还不能算是骆驼。

王捷

“正龙拍虎”与“曙光拍虎”之间的逻辑关系

自“正龙拍虎”酿成丑剧,“华南虎”这个名词就成了众网友戏谑的“杯具”。近日,一位安徽游客鲍曙光偏不信这“杯具”的邪,他在三清山游玩时拍摄到了一组类似老虎的图片,随后就把“虎照”上传到了网上,并将“虎照”送给了三清山管委会。一起全新的“鲍老虎”事件由此横空出世。(11月3日《广州日报》)

三清山不是一座寂寂无名的野山,而是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德兴市、玉山县交界处的一个风景区。地方不大,中心景区不过71平方公里。还紧靠浙赣铁路和320国道线。就是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下,一个天气晴朗、阳光充足的下午,鲍曙光发现自己对面100多米的山林间突然出现了一只金黄色的动物,他大喊:“老虎,山上有老虎!”并顺手拍摄了4张“疑似华南虎”的照片。

当年,“周老虎”是在莽莽苍山中拍虎,“曙光拍虎”演进一步,居然是在游人如织的风景区拍到了老虎。三清山也是山,但它是得到充分开发的,是紧挨铁路和国道的

山,是各种响动都很大的山,是虎很少的山,这样一个极不适宜老虎生存的地方,发现了老虎,这能是一只什么虎?即使真有老虎,从老虎昼伏夜出习性讲,怎么可能在大白天跑到人群拥挤的旅游景区来?事实真相是,从2006年开始,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就在三清山开展“生物多样性”科学考察,发现了这,发现了那,就是没发现过类似老虎的踪迹。学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动物学专家表示,野外华南虎生存几率极小。这等于就说是华南虎已经灭绝了。老虎作为哺乳动物,小老虎都是由母亲生出来的,又不会从石头缝里蹦出,没有一个足够繁衍存活的种群,哪会冒出个老虎?事件的当事人鲍曙光有意回避

记者采访,三清山风景区管委会宣传部部长李华却是有意混淆事情的真相,他既肯定照片不太可能造假,又声称“与三清山属同一区域的宜黄从前有华南虎出没,这增加了照片上的动物是华南虎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还是相信此山有老虎,并且也想让公众相信。

从“正龙拍虎”到“曙光拍虎”,这里面存在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既是闹剧,总有起因。可以说,正是因为没有老虎了,所以拍虎闹剧才一演再演。老虎可不是吃素的家伙,也不爱跟人玩,如果真有老虎生活在山里,一些人断然不会没事找事,动辄就近距离地拿着相机对准它们。拍虎人不是武松,当老虎扑上来,会突然生出搏虎的本领。闹剧一再重演,表明的是某些人的浮躁心理及急功近利思想。他们假借珍稀野生动物之名造势,甚至于作假、欺骗世人,说到底还是为了一己之利和己所从属的小团体的利益。就三清山风景区来说,因那里发现了“疑似华南虎”,为保护这种珍稀的野生动物,事关了三清山风景区的大门,给老虎一片生活的天地,岂不更好?只是如此一来,就断了一些人的财路。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如果那样,他们绝对不会再去捉虎,不会再去招摇、炒作,搞得自己地盘上,好像真有老虎似的。

今语

“农民变市民”运动充满诡异与欺骗

“被上楼”作为一种激进城市化举措的代名词,正在成为热词。当年,麦子的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将农村子弟想变成城市人的热望写得情切意绵绵,而当下,20多个省市的激进城镇化之路,却似乎不能对接这种愿望,没有让人看到那种理想状态下的国家将数亿农民全面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大规模变革,一些城市猴急的“请君入瓮”举措与野蛮强拆乱政,让这场简单化冒进式的农民变市民运动,更添诡异与欺瞒意味。

并且,无论是对已往的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的调查,还是对现行模式下对大量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生存发展蓝图进行描绘,得出的似乎都不是乐观与和谐的景象。那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生存感觉会告诉你,我奋斗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

“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最后演化成“被上楼”,是把农民土地腾挪出来,成为城市土地财政的资本,却没有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别,而是再一次牺牲农村成就城市,城市圈地变现的一锤子买卖,不管子孙的长久未来,得到了“流转”而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几万、一亩买来,几十万或几百万一亩卖出,还得了人口红利,解决了民工荒,但对农民的农民所得呢?最多只能做到保生存,而无发展。

我的一个表兄便经历了被城市“吞吐”的旅行,他的身份变化仅仅是由农民变成了城市贫民,如此而已,他得到了城市身份,但体会不到任何优越性,他发现这城市身份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好处,比如就业,就与城市身份毫无关系,变了城里人也仍然是走进血汗工厂下苦力,即使有收入,也是低收入,而一旦失业,每月500元左右的失业补贴等城市社保之类,连租房都不够,更谈不上拉动内需。生活在农村,他还有基本的经济来源蓄水池,那名下有使用权的土地还有增值的空间,成为幸福的念想,可进城后,生活成本大增,譬如住房,连城市精英人群也喊买不起的住房,就别想了,而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生活成本大增,使其深感压力而恐慌,其农村生活习惯与记忆顿时斩断,回到农村的退路被切断,其内心更加焦灼。

之前国家所倡导的新农村建设,以及所强调的中小城市建设,现在似乎被这股“被上楼”风潮淹没了,“被上楼”对应的是农民进大城市与特大城市,本来这样的城市资源就很匮乏,大量进驻失地农民,就更加剧了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将转型做得更不堪,让农民失地,却给的是“城镇户口”,而不是“城市户口”,这一区别,将失地农民捆绑在小城镇,失的是真真切切,得的却是镜中水花,如此将转型的“掠夺”意味表现得更为露骨。

种种迹象表明,权力和资本媾和的“被上楼”,已变异为一具怪胎,让城市生财而让农民受损,如此将使国家追求的“橄榄型”社会化为泡影,使社会结构仍是“金字塔形”,并且还急速增大了“金字塔”的塔基部分,更加印证了中国中产阶层还未成型就开始塌陷的预言。此类乱象,迫切期待中央的及时叫停或纠偏。 杨光志